



论 1927—1930 年上海文学期刊编辑策略的改变

Analysis on the Editorial Strategies of shanghai literature journals in 1927-1930

包薇

BAO WEI

内蒙古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baowei519@sina.com

Received: 13 March 2019 / Revised: 3 May 2019 / Accepted: 22 May 2019

摘要

1927 年后革命文学兴起, 新的文学样式需要新的传播阵地, 这为文学期刊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上海作为当时出版业的聚集地, 大量推出的书刊多为数学教科书或童话, 或者是商业性、消遣性刊物, 文学期刊的出版相对较为困难。许多文学期刊开始调整编辑策略, 采用顺应时代的编辑理念、平实通俗的编辑风格和书刊互动的发行模式以求得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 上海 革命 文学期刊 编辑策略

ABSTRACT

After the rise of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1927, the new literary style needed a new propagation position, which provided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periodicals. Shanghai, as the gathering place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had published many books and magazines, or a fairy tale, or a commercial and recreational publication. However, the publication of literary periodicals was relatively difficult. Many literary journals had to change the strategy in editing. They selected Editorial Ide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s、Plain and popular editorial style and The Interactive Distribution Model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in the speci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Key Words: Shanghai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Literary journal Edit Policy

期刊是一种能够动态表现社会脉动的出版物，其定位、内容选择、栏目设置、编排方式等编辑理念无一不受社会政治、文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学期刊这一特定类别突出地反映出出版物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即作为媒介的期刊与作为内容的文学作品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期刊是文学作品传播的优质载体与有力渠道，勾勒着文学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特征；另一方面，期刊的载体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特征的发展起着塑造和渗透的作用。

文学在特殊时期对人们的影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近代思想家戴季陶认为：“文学之深入人心，较之论政谈学，其力不啻百倍”，“一国治乱，系于政治之隆污。政治之隆污，系于人心之善恶。文学美术，其力足以转移人心，其功足以荫庇后世，一字一句，都关乎人民之生死，社会之安慰。”（戴季陶的文艺见解，1929）1927 年开始，大批作家向上海迁移，文学、文化中心也因此南移；1928 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新的文学样式需要新的传播阵地，这为文学期刊的发展提供了良机。自 1922 年，中国文学期刊创刊数目首次突破 100 种（刘泉、刘增人，2014:38）之后，1927—1930 年的文学期刊数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趋势；到 1928 年，已突破 200 种（刘泉、刘增人，2014:38）。上海作为当时出版业的聚集地，本地文学期刊的数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刘泉、刘增人，2014:38），本地印行的图书数量甚至达到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但这一时期的上海出版界，能够大量推出的书刊多为数学教科书或童话，或者是商业性、消遣性刊物，文学期刊的出版相对较为困难，因此文学期刊不得不转变或调整编辑出版策略以求得更好的发展。

一、顺应时代的编辑理念

社会的总情势会在很大程度影响和制约着期刊的编辑和出版，1927 年后革命文学渐渐高涨，其作品大多取材于革命时代的生活，书写革命者的故事并杂糅恋爱的场面，或用赞赏的语调表现革命者的献身精神，或宣泄革命者的憎恨与复仇的情绪。这些作品一方面顺应了时代的革命潮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要，风行一时。为此很多文学刊物都开始刊登革命文学作品，当时“占上海出版界的一大部分势力的，是以革命文学相号召的小型文艺杂志、或是月刊、或是半月刊、或是周刊”（最近上海的出版界，1928）。鲁迅在 30 年代初给友人的信中也这样说到：“近来颇流行无产文学，出版物不立此为旗帜，世间便以为落伍”（鲁迅，1976:254）。1928 年《流沙》创刊，便表示“要紧紧的把捉着无产阶级的意识和精神”（编者，1928）在文坛另辟一块荒土。除了新刊，一些老刊在当时的形式下也纷纷转向，比如向来以稳健著称的《东方杂志》开始大登其苏联教育的特载；《小说月报》也开辟篇幅介绍苏俄的文艺理论，出版“现代世界文学特号”；《新文艺》第 1 卷第 5 号发表声明从第 2 卷起“编辑方针也决定改换一种精神”（编辑的话，第 1 卷第 5 号）；甚至素以唯美派自居的《金屋》也开始刊登革命文学作品。

叶灵凤编辑的《现代小说》的转变在这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现代小说》是“一个专载



小说的月刊”(现代小说出版预告, 2 卷 6 期), 叶灵凤曾声称, 他创办《现代小说》的目的, 是为了赚钱, 走的是商业化的路径。《现代小说》“买卖也。有书局, 有读者, 有钱, 有稿、旁的不问。”(白门秋声, 1928)《现代小说》前两卷所载的作品多写资产阶级青年的生活、爱情和苦闷, 主要撰稿人有叶灵凤、潘汉年、楼建南、严良才等人。但到了 1929 年, 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 这个商业性的文学期刊也开始改变编辑策略。同年 6 月叶灵凤在《现代小说》2 卷 6 期上刊登广告, 宣布“现代小说大扩充”, “内容完全更新”, 今后要努力介绍国内的“新兴文学运动”, 介绍“新出版的书报”, 扶持“被压迫的无名作家”并介绍“世界新兴文学及一般弱小民族的文艺”(现代小说大扩充, 2 卷 6 期), 从第三卷开始, 栏目设置包括小说、论文、杂著等, 3 卷 1 期的《现代小说》堪称“特大号”, 共有 345 页。扩充后的《现代小说》, 刊登了许多革命文学的作品, 比如金满成的《参考书》、向培良的《一个卑微的故事》、洪灵菲的《信》、叶灵凤的《神迹》等; 翻译方面也倾向于俄国的文学作品和理论, 如佐木华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我的童年》、朱镜我翻译的波里耶斯基的《文学批评底观点》、R 的《俄国剧场的变革》等; 在文艺通信栏里还刊登了潘汉年撰写的《普罗文学题材的问题》。在该期的《编者随笔》中, 还明确表示以后要有系统地介绍国内外的新兴文学, 增加理论批评的文字, 报道左翼文艺运动的动态。在很多人看来, 《现代小说》这种“坚决地”转变, 虽然“令人疑惑, 但亦令人肃然起敬”(许由, 创刊号)。叶灵凤转变《现代小说》的编辑理念, 也许同样是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心理, 仍然是处于盈利的目的, 但其顺应时代潮流的努力值得肯定。

文学期刊的这种转变在当时并不是“一两个编杂志的人的转变; 大原因是时代的大轮在推动着, 革命的高潮已经又在汹涌澎湃了。”“无论那一本杂志, 不管他是怎样的腐败不堪, 它总要夹上一两篇左倾的文章。没有左倾文章的杂志, 那销路就大大的不行, 迫得编者不得不俯就时势潮流了。”(许由, 创刊号) 这样的说法虽然不一定完全可靠, 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文学期刊的编辑努力顺应时代潮流的编辑倾向。

二、平实通俗的编辑风格

编辑理念的变化, 导致文学期刊的编辑风格也开始发生变化。1928 年, 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主干, 包括我们社和引擎社等普罗文学新军, 合力掀起的革命文学的旋风, 打破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弥漫于文坛的苦闷沉寂空气。对于革命文学, 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形式上应该是“讽刺的”、“暴露的”、“鼓动的”、“教导的”, (李初梨, 第 2 号) 1928 年郁达夫创办《大众文艺》, 刊名即强调“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达夫, 第 1 期)。同年 3 月, 《流沙》半月刊创刊, 发刊《前言》中声称“我们对于艺术的手法的主张, 是 Simple and Strong”, 并鼓动以“粗暴的叫喊”来代替“风花雪月”, 追求一种“力之美”(前言, 1928)。因此一些革命文学作品为了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 甚至不惜夹杂大段的口号, 成为茅盾所谓的“‘买膏药式’的”“江湖口诀那样的标语口号式或

广告式的无产文艺”(茅盾,第370期)。革命文学的这种形式,某种程度上要求作为其传播媒介的文学期刊在整体的行文和风格上要尽量口语化、简单化,因此这一时期的很多文学期刊,特别是左翼文学期刊,编辑风格都呈现出平实化、通俗化的倾向。

首先采用图文并茂的编辑形式。叶灵凤在扩充《现代小说》时,除了“内容完全更新”,在编辑风格上也做了很大的改变,为求“美观耐久”将期刊印刷的纸张“改用洁白厚报纸,铜版纸封面,两色插图”,插图包括现代世界著名作家肖像、现代中国作家肖像、文艺讽刺画和与文艺相关的绘画、摄影,“小说内有时亦增入插画”。(《现代小说大扩充》,2卷6期)3卷1期出版时,面貌焕然一新,卷头插入一幅俄国人创作的名为《红的天使》的插画,意为“红的天使将革命的火焰向世界散布”(编者随笔,3卷2期),还刊有辛克莱、高尔基、吕费诺斯、郭沫若、周全平、金满成等的肖像画。这一时期,文学期刊中插图的使用已非常普遍,像《创造月刊》、《幻洲》等刊物,不仅有封面画和插图,而且还有刊头装饰画。《幻洲》创刊于1926年6月,分上下两部,因为刊登了一系列的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曾多次被查禁。1928年,被查禁的《幻洲》改为《戈壁》(上部)和《战线》(下部)继续出版。同年5月1日《戈壁》创刊,叶灵凤在刊头发表了自创的宣传画——《未来的胜利》,标明为“纪念五一劳动节”而作。画面上有模拟的炼钢工人的形象,手持镰刀和斧头,中间是鲜红的一个很大的“5”字,还有不少的工厂的烟囱和钢架,斗争色彩十分浓郁。这些插图和宣传画,一方面使期刊的版面变得生动活泼,广大读者能在刊物上看到作家的具体形象,满足读者的视觉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对期刊的内容起到一定的诠释作用。这一时期,很多文学刊物不再将盈利作为期刊运营的主要目的,而是希望通过期刊宣传一种思想和理念,起到鼓舞、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目的。如《战线》创刊号上发表了《〈战线〉的开场》一文,明确表示“我们甘愿顶着反动的罪名跑上战线去冲锋,不能目视敌人猖狂而退缩,我们甘愿牺牲在权威的枪炮之下,不能为了个人的苟安偷生而做忠顺的奴才。”(潘汉年,第1期)整个刊物的政治色彩十分浓厚,就连补白的地方也写满了激愤异常的匕首式的短语,这些强烈的措辞,义无反顾的革命立场,导致《战线》出至第7期,便被查禁。

其次通过征稿调动读者积极性。在当时的很多期刊编辑者看来,将期刊切实普遍化、通俗化并不是靠几个编辑者的片面努力可以做到的,他们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也能积极参与到期刊的发展中来。1928年《思想》第2期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一方面为读者着想,努力“使文体逐渐平明简易化起来”,另一方面也希望读者最好是将刊物“当作自己的东西看待,将自己要说的话或不得不说几句的切身的种种问题写寄给我们”(编后杂记,第2期)发表出来;第3期进一步表达希望读者能“踊跃地写稿”以使刊物“生气蓬勃地”(编辑后记,第3期)发展起来的愿望;到了第5期,《思想》上的论文已“差不多都是未知的朋友”(编辑后记,第5期)的投稿。1929年扩充后的《现代小说》也曾表示他们“绝不会把持着剥削旁人发表的机会”,并计划在3卷2期举行“无名作家短篇处女作悬赏征文”(编者随笔,3卷1期)。这些征稿举动,不仅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丰富了期刊的内容,也无形中增加了期刊的销量。



三、书刊互动的发行模式

严格的书刊审查制度，造成了“好看的书不好出，好出的书不好销”的局面，于是一些人开始自办书店，采用书刊互动的形式争取发行的自主权。1927 年之后新书店的大量涌现可以说是上海文化界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些新书店对上海文学期刊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据统计，1927 年上海新开的书店就有现代书局、光明书局、中央书店、新月书店、新亚书店、华通书局、美的书店、真美善书店、春野书店、宏文成记书局；1928 年开办的书局有惜阴书局、大江书铺、第一线书店、昆仑书店、南强书局、红黑出版社、春潮书局、乐群书店、金屋书店；1929 年之后新开的书局有大中华书局、艺文书局、黎明书局、水沫书店、辛垦书店、乐华图书公司、江南书店、上海联合书店、文献书房等。在《大江》月刊创刊号上刊登的《出版界消息》一文中，就描述了 1928 年上海北四川路一带书店丛生的现象：“在北四川路的，有创造社的出版部，春野书店，复旦书店，新宇宙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及老爷书店，商务印书馆虹口支店与教会的协会书局广学会售书处；东宝兴路第一线书店；老靶子路，时代书店及骆驼书店筹备处；吟桂路，乐群书店；东横滨路景云里四号，大江书铺。”（《出版界消息》，1928）由于新书业的发展，四马路遂成为著名的文化街。（张静庐，1994:123-128）

这些新涌现的书店，在出版图书的同时，往往也发行自己的文学期刊，采用书刊互动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出版资源；一些书店为了避免出版图书“亏血本”，甚至转而以出版文学期刊作为谋生之道。这些书店一方面“他们营业的目标都很集中”，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新书出版上，出版十分迅速。有人说在这些新书店中，“一部十万字左右的稿子”，“至多只要三四个月便可印出”（汪荫桐，1928）。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出版速度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他们没有那种历史的因袭观念，对于装订、封面、排版的种种方面，都尽量采用新法。”书籍的装帧更加精美，因此“同一著者的著作，在旧书店发行，一年中只能销两千部的，在新书店……可销到四千部。”（汪荫桐，1928）此外这些书店的定期刊物大致都能够按期印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中国出版界“定期刊物不能按期出版”的局面。（汪荫桐，1928）有的刊物甚至在发行时就明确表示“以后本志必能按期出版，月月与读者相见。”（编辑杂记，第 4 期。）

春野书店创办于 1927 年底，是太阳社的发行机构，发起人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等。春野书店除出版大量的革命文学书刊，如“太阳小丛书”、轱辘小刊外，同时还发行《太阳月刊》。1929 年春野书店因出版、销售进步书籍和刊物，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但是杨邨人等人并不妥协，1929 年 10 月 15 日，他们创办了《新星》半月刊，由新星社出版部编辑发行，上海北四川路星野书店总代售。其实星野书店的地址亦即春野书店的旧址，他们想用《新星》来代替被查禁的《太阳月刊》，用星野书店来代替春野书店。在《创刊致辞》中，编者指出“目前中国的文坛”，青年们对于良好的文艺刊物的需求已如“大旱之望甘霖，饥谨之想面包”，所以为编者为了“推进社会文化”不惜“自己节省费用，发行这新星半月刊”（创刊致辞，1929）。但“因刊物至被摧残，而连累发行的书店”（创刊致辞，1929）的事情时有发生，“不敢担保”刊物“寿命之短长”，所以“函购只以每期为限”。（本



刊函购优待条例, 1929) 果然, 好景不长, 出版一期之后就夭折了。虽然这些书店还有很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 但他们的出现一方面刺激了上海的图书出版业,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文学期刊的发展, 他们的努力已经是难能可贵。

文学期刊作为文学作品传播的优质载体与有力渠道, 勾勒着文学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特征; 同时文学期刊作为一种能够动态表现社会脉动的出版物, 其编辑理念、编辑风格、发行方式等也要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上述文学期刊编辑者在 1927 年至 1930 年对编辑出版策略的调整正是特殊时代环境下的产物。经过革命文学家和文化人的艰苦努力和抗争, 革命文学的作品得以走向大众, 并得到了极大的欢迎。正如茅盾所说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艺的大举‘围剿’, 其结果与他们的愿望正相反, 革命文艺更加深入人心了!” (茅盾, 1981:235)

参考文献

- 白门秋声. 杂志新语. 戈壁[J]. 创刊号. 1928-5-1.
 本刊函购优待条例. 新星[J]. 创刊号. 1929-10-15.
 出版界消息. 大江月刊[J]. 创刊号. 1928-10-15.
 达夫. 大众文艺释名. 大众文艺[J]. 第 1 期.
 许由. 中国文坛消息杂记. 新星[J]. 创刊号.
 许由. 现代小说的革新. 中国文坛消息杂记. 新星[J]. 创刊号.
 创刊致辞. 新星[J]. 创刊号. 1929-10-15.
 刘泉, 刘增人. 民国文学期刊论纲[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4 年(4):38.
 李初梨.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文化批判[J]. 第 2 号.
 汪荫桐. 小书店的发展与后期新文化运动. 长夜[J]. 第 3 期. 1928-5-1.
 张静庐. 在出版界二十年[M]. 台北: 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123-128.
 现代小说大扩充. 现代小说[J]. 2 卷 6 期.
 现代小说出版预告. 幻洲[J]. 2 卷 6 期.
 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35.
 茅盾. 读倪焕之. 文学周报[J]. 第 370 期.
 前言. 流沙. 创刊号. 1928-3-15
 编后杂记. 思想[J]. 第 2 期.
 鲁迅. 致李秉中. 鲁迅书信集(上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254.
 最近上海的出版界. 申报·艺术界[N]. 1928-4-28.
 编者. 后语. 流沙[J]. 创刊号. 1928-3-15.
 编者随笔. 现代小说[J]. 3 卷 1 期.



编者随笔. 现代小说[J]. 3 卷 2 期.

编辑后记. 思想[J]. 第 3 期.

编辑后记. 思想[J]. 第 5 期.

编辑杂记. 新思潮[J]. 第 4 期.

编辑的话. 新文艺[J]. 第 1 卷第 5 号.

潘汉年. 战线的开场. 战线[J]. 第 1 期.

戴季陶的文艺见解. 民国日报 • 青白之园[N]. 1929-2-3.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Wei BAO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Mater Degree (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ddress (地址) : No. 24, Zhaojun Road,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Yuquan District, Hohhot 010070, P.R.China